

Huber, E. (2016). Carl Menger and the Spanish Scholastics. *Procesos de mercado: revista europea de economía política*, 13(2), 87-142.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 卡尔·门格尔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

埃利亚斯·胡贝尔 (Elias Huber) \*

摘要：本项工作调查了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是否在经济思想史方面影响了卡尔·门格尔。我们根据门格尔在其《原理》中引用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文献，对作者的名字进行了关键词研究。我们也检查了卡尔·门格尔藏书和门格尔的著作以供参考。结果表明，似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影响。

关键词：卡尔·门格尔，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萨拉曼卡学派，德国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主观价值论。

### 一、序言

越来越多的共识是，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预见到了 (anticipated) 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关键见解，特别是在价值理论方面 (Hülsmann 2007, 112; 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4; Rothbard 2006c [1976])。然而，这种观点经常与另一种论题并驾齐驱。因为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们拥有如此高水平的知识，通过某种方式——这是隐含或明确假设的——他们一定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甚至卡尔·门格尔本人。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想法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的传播。提出这样的理由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门格尔在西班牙经院哲学之后 250 年写下了他的《原理》，而无法与我们的西班牙作者们交流。他可能读过他们的所有书，然而，批评家可以合理地争辩说，门格尔自己发现了主观价值理论。即使门格尔会引用西班牙人几次，他也可能只是引用他们来支持他自己的想法。如果门格尔没有参考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举证责任会变得更高。现在我们要寻找一个既受西班牙人影响又影响了门格尔的传播者。无论哪种方式，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是否在思想史方面影响了卡尔·门格尔？

科学家表示智识债务的常用方法是引用。因此，我们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学家著作中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名字进行了关键词研究。我们的研究问题是高度重要的。不仅因为西班牙的几个智库诉诸于西班牙经院哲学 (胡安·德·马利亚纳研究院、科瓦卢比亚斯中心)，还因为罗斯巴德对思想史的修正。根据这位学者的说法，亚当·斯密标志着经济学的倒退，因为他支持更客观的价值理论 (Rothbard 2006b [1995], xi)。因此，奥地利学派传统不应追溯到英国古典主义，而应追溯到萨伊、加利亚尼 (Galiani) 或经院哲学家等思想家。结果如下：第二部分涉及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所预见到的十种奥地利学派观点。第三部分是关于过

---

\*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博士候选人。作者要感谢 Philipp Bagus 教授，在他的指导下这项工作被发展为了硕士论文。他还要感谢 Georg Bühler 对一些翻译的宝贵帮助。Kristof Berking、Christian Schneider 和两位匿名审阅人进一步提供了有益的批评。所有的错误都归作者所有。

去关于影响的调查结果。第四部分寻找门格尔和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之间的直接联系。第五部分调查西班牙人是否影响了德国经济学家。第六节考察了意大利经济学在传播西班牙价值学说中的作用。核心结果是似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影响。

## 二、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十大预见

韦尔塔·德索托教授的成就指出了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许多学术成就。在他们的著作中，他发现了十个“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关键原则”（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3）。它们是：第一，主观价值论（迭戈·德·科瓦卢比亚斯·莱瓦）；第二，价格与成本之间的正确关系（路易斯·萨拉比亚·德·拉卡列）；第三，市场的动态性和均衡模型的不可能性（胡安·德·卢戈、胡安·德·萨拉斯）；第四，竞争的动态概念被理解为卖家之间的竞争过程（卡斯提略·德·波瓦迪亚、路易斯·德·莫利纳）；第五，重新发现时间偏好原则（阿斯皮奎塔·纳瓦罗）；第六，货币通胀增长对价格的扭曲影响（胡安·德·马利亚纳、迭戈·德·科瓦卢比亚斯、阿斯皮奎塔·纳瓦罗）；第七，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务的负面经济影响（路易斯·萨拉比亚·德·拉卡列、阿斯皮奎塔·纳瓦罗）；第八，银行存款是货币供应的一部分（路易斯·德·莫利纳、胡安·德·卢戈）；第九，由于缺乏信息，不可能通过强制命令组织社会（胡安·德·马利亚纳）；最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立场是，任何不正当的国家干预都违反了自然法（胡安·德·马利亚纳）（同上）。让我们一步一步地通过证据。迭戈·德·科瓦卢比亚斯·莱瓦（1512-77）部分地对第一个关键原则——主观价值理论达成了正确理解。1555年，他写道：

“一件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它的基本属性，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主观估计，即使这样的估计是愚蠢的”。他使用这个例子阐明他的观点，“尽管小麦的属性是相同的，但是印度的小麦价格高于西班牙，是因为这里的人们认为它的价值更高”（Huerta de Soto 2009b [1999], 206）。

大多数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不是像科瓦卢比亚斯那样的主观主义者，但他们都同意劳动力或生产成本在决定价格方面只起次要作用（Grice-Hutchinson 1952, 49）。学者们的一个标准用语是“共同估计（common estimation）”，它指的是在市场上设定公正价格（just price）的个人估计的总和。因此，公正价格归根到底是市场价格。出于道德原因，经院哲学家们坚持共同估计。在他们看来，消费者比生产者更穷、更处于困境。因此，他们担心生产或劳动力成本会给生产者一个借口，以向穷人收取更高的价格（同上，27）。第二位明显的西班牙主观主义者是路易斯·萨拉比亚·德·拉卡列。在他的《商人指南》（*Instrucción de mercaderes*, 1544）中，他否认生产成本在价格决定中起任何作用：

那些通过经营该商品或生产该商品的人所招致的劳工、成本及风险，或交通费用或往返展会的交通费用，或者他必须为他们的勤勉、风险和劳动力支付的要素来衡量公正价格的人，是大错特错的，允许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一定利润的人更是如此。因为如前所述，公正价格来自商品、商人和货币的丰富或稀缺，而不是成本、劳动和风险。如果我们必须考虑劳动力和风险来评估公平价格，那么任何商人都不会遭受损失，

商品和货币的丰富或稀缺也不会成为问题。价格通常不是根据成本确定的。为什么花费巨资从布列塔尼陆路运来的一包亚麻布比通过海运廉价运输的亚麻布更值钱？（……）为什么手写的书比印刷的书更有价值，虽然印刷成本更低，但后者更好？公正价格不是通过计算成本而是通过普遍的估计来找到的（Grice-Hutchinson 1952, 81-2）。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也提出了中世纪关于货币价值的观点。他们的前辈认为，货币的价值来源于 1）其功能的实现，例如作为价值尺度或交换手段，2）君主的法令，或 3）金属含量的市场估计（同上，30）。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仍然坚持将这些理由作为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但也将他们的主观理论应用于货币。因此，持有货币的估计取决于稀缺性、供应、需求、效用等通常的因素，决定了它的价值（同上，51）。“因此，我们的作家将财货与货币纳入单一价值理论的范围”（Grice-Hutchinson 1952, 50）。抛开他们后来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价值理论，我们转向第二个关键原则：价格和成本之间的正确关系。萨拉比亚·德·拉卡列在他的《商人指南》（1544）中再次意识到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反之亦然：

以经营者或生产者所承担的劳动、成本和风险来衡量商品的公允价格，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公平价格源于财货、商人和货币的丰富或缺乏，而不是成本、劳动力或风险（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0）。

耶稣会红衣主教胡安·德·卢戈和胡安·德·萨拉斯认识到市场的动态性和均衡模型的不可能性。市场处理的信息如此之多，以至于中央计划者不可能知道均衡价格和其他数据。胡安·德·卢戈早在 1643 年就表达了这一见解，当时他写道，均衡取决于如此多的情况，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同上，31）。第四，卡斯提略·德·波瓦迪亚和路易斯·德·莫利纳将竞争描述为卖家之间竞争的动态过程。波瓦迪亚在他的《最高行政官的政治学》（*Política para corregidores*, 1585）一书中写道，竞争具有模仿竞争对手的积极作用。此外，他还确定了以下经济原则：“由于卖方的丰富、相互竞争和同意，产品价格将下降”（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1）。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还重新发现了时间偏好法则，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动者总是更喜欢现在而不是未来的物品。吉尔斯·德·莱西内斯（Gilles de Lessines）早在 1285 年就发现了这条定律，但马丁·德·阿斯皮奎塔将其重新表述如下：“对某物的索取权低于该物本身的价值，而且……很明显，一年内不能使用的物品不如立即可用的同质量物品有价值”（Rothbard 2006a [1995], 107）。胡安·德·马利亚纳、科瓦卢比亚斯和阿斯皮奎塔进一步认识到通货膨胀（被理解为货币供应的人为扩张）的扭曲影响。胡安·德·马利亚纳在他的著作《论货币的变更》（*De Monetæ Mutatione*, 1609）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见解。在那里，他指责费利佩二世国王贬值铜币，导致西班牙出现价格通胀。与其人为地扩大货币供应量，不如自愿地估计货币的价值：

只有傻瓜才会试图以法定价格与自然价值不同的方式区分这些价值。当统治者命令普通人认为价值是比方说 5 的物品，应该售价为 10 时，他是愚昧的，不，是邪恶的。在这件事情上，一般性的估计引领着人们的

行动，这个估计基于人们对商品质量的考量和商品的充裕或稀缺。君主尝试破坏这些商业的基本原则是徒劳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使得它们不受干预，而不是通过暴力扰乱它们而使得公众受到伤害（Rothbard 2006a [1995], 120）。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也批评部分准备金银行。萨拉比亚·德·拉卡列认为银行家违反存款合同是非法的和严重的罪行（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2）。托马斯·德·梅尔卡多（Tomas de Mercado）、阿斯皮奎塔和德·拉卡列要求银行以100%的准备金要求运营。更重要的是，西班牙人知道存款是货币供应的一部分。路易斯·德·莫利纳于1597年意识到银行通过无中生有地创造存款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同上，33）。最后，胡安·德·马利亚纳预见了奥地利的另外两个关键原则。他写道，通过强制命令来组织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局“不了解人民，也不了解事件——至少就其成功所依赖的所有情况而言。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犯许多严重的错误”（同上，33）。他还预见到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指出国家的任何不正当干预都违反了自然法（同上，34）。因此，鉴于这十大预见，研究人员是否也相信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了后世的经济学家？

### 三、奥地利学派：西班牙和天主教的起源？

在对查富恩（Chafuen）关于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的著作的介绍中，拉斐尔·泰尔梅斯（Rafael Termes）写道：“因此，我认为，无论马克斯·韦伯喜欢与否，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起源是西班牙和天主教的”（Chafuen 1991 [1986], 14；自己翻译）。在下文中，我们将检验是否有更多的研究人员同意泰尔梅斯的结论。

#### 1.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与泰尔梅斯持相同观点的研究人员之一是韦尔塔·德索托。他认为，萨拉曼卡学派的思想被门格尔“采纳”并给予“明确的推动”（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4）。此外，他认为西班牙经院哲学是“奥地利学派的真正起源”（Huerta de Soto 2010 [2009]），萨拉曼卡大学是“奥地利学派的发源地”（Huerta de Soto 2009a [1997], 265-6）。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韦尔塔·德索托为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影响卡尔·门格尔的论点辩护。除了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证据之外，韦尔塔·德索托还用另外两个论点来支持他的观点。一方面，他提到门格尔在他的《原则》中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0）。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研究这句话。他还认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存在“密切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关系”：

为了理解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们对后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我们必须特别记住，16世纪西班牙的皇帝兼国王查理五世把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派遣到奥地利任国王。“奥地利”的意思是“帝国的东部”，在当时，帝国几乎包括除了法国外的所有欧洲大陆，而法国是被西班牙军队包围的一个孤岛。因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西班牙经院哲学对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影响，这不是完全的巧合也不是对历史的想象，而是源于从

16 世纪 (Bérengruer 1993, 133-335) 开始一直延续在西班牙和奥地利间紧密的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关系。另外, 意大利在这些关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座真正的文化桥梁, 帝国的两端 (西班牙和奥地利) 之间的知识交流流经于它。(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4)。

关于这段引文有两个重要的评论。首先, 韦尔塔·德索托只提供了链接的上下文证据。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关系”可能表明存在联系, 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出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对门格尔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论点。其次, 韦尔塔·德索托将意大利视为一座“文化桥梁”,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知识通过它流动。这个陈述可以用两种方式解释。韦尔塔·德索托暗示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影响了意大利经济学家, 后者直接影响了门格尔。或者他认为意大利人影响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第四方, 然后影响了门格尔。这两种解释都在后面的部分中进行了调查, 其中第四 (和第五) 方是法国 (和德国) 经济学家。

## 2. 马乔里·格莱斯-哈钦森

英国历史学家马乔里·格莱斯-哈钦森 (Marjorie Grice-Hutchinson) 对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最重要的研究。Grice-Hutchinson (1952, 60) 在她的著作《萨拉曼卡学派》(*The School of Salamanca*) 中确定了西班牙人做出重要贡献的三个知识领域: 货币数量论、购买力平价论和主观价值论。前两个领域的贡献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例如, 让·博丹 (Jean Bodin) 在马丁·德·阿斯皮奎塔十二年后独立发现了数量论 (同上, 61)。格莱斯-哈钦森总结道: “那么, 在他们对价值的分析中, 我们的西班牙作家似乎对经济理论做出了最持久的贡献” (同上, 77)。她如何追溯萨拉曼卡学院的这一贡献? 她首先指出让-巴蒂斯特·萨伊 (Jean-Baptiste Say) 是 19 世纪主观价值理论的“主要代表” (同上, 62-3)。这种主观主义观点“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孔狄亚克 (Condillac)、杜尔哥 (Turgot) 和加利亚尼的著作” (同上, 63)。加利亚尼当时——在她看来——是第一个阐述一致的主观价值理论的人, 她停止了追踪联系:

像一个世纪后的杰文斯一样, 孔狄亚克和杜尔哥似乎认为他们自己对效用的强调是一种新事物。他们承认的唯一前身是加利亚尼, 乍一看, 他对效用的出色分析似乎已经完全成熟: 无论如何, 加利亚尼本人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早期资料的线索 (Grice-Hutchinson 1952, 63-4)。

她当然没有发现的是加利亚尼在《论货币》(*Della Moneta*, 1751) 中, 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 对科瓦卢比亚斯的引用。Raymond de Roover (1974, 334) 后来发现了这个引文。表 1 显示了格莱斯-哈钦森在随后的文献中发现的所有对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引用。迄今为止, 最多的参考文献可以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文献中找到。比利时人伦纳德·莱修斯 (Leonard Lessius) 是最重要的追随者。他深受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影响, 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是萨拉曼卡学派的一员 (Grice-Hutchinson 1998, 245)。《原理》中唯一引用的作品是加利亚尼的《论货币》。我们将在第六节仔细研究它。请注意, 格莱斯-哈钦森没有发现对法国经济学家如杜尔哥、孔狄亚克、魁奈或萨伊的提及, 他们也阐述了

相当主观的价值理论。如果有的话，经院哲学学说本可以从意大利传到杜尔哥和孔狄亚克。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文章《关于奥地利学派史前史的新认识》（*New Light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1976）中论证了这种联系。最后，格莱斯-哈钦森总结道：

圣师们（Doctors）<sup>1</sup>所持有的主要是主观或效用的价值理论因此得以保存并通过许多渠道传播。毫不夸张地说，从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到近代，效用理论不断发展，即使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声望也不足以完全淹没它。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在这项传播和发展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Grice-Hutchinson 1978, 115）。

似乎格莱斯-哈钦森捍卫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所有“现代”经济学家的联系。因此，萨拉曼卡学派在传播学者们的主观教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她并没有明确谈到奥地利学派和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之间的联系。

表 1  
根据 GRICE-Hutchinson (1978, 107-21; 1998) 对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引用

国家	引用了关于经济学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作者 <sup>1</sup>
比利时	Leonard Lessius ( <i>De justitia et jure</i> , 1605)
德国	Samuel von Pufendorf ( <i>Elementorum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 libri 2</i> , 1660; <i>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i> , 1672; <i>De officio hominis et civis juxta legem naturalem</i> , 1673)
意大利	Pietro Catalano ( <i>Universi juris theologico-moralis corpus</i> , 1728), Martino Bonacina ( <i>Opera omnia</i> , 1646), Antonio Diana ( <i>Summa diana</i> , 1646), Giambattista de Luca ( <i>Theatrum veritatis et justitiae</i> , 1669-81; <i>Il dottor volgare</i> , 1673), Clemente Piselli ( <i>Theologiaemoralis summa</i> , 1710), Ferdinando Galiani ( <i>Della Moneta*</i> , 1750)
西班牙	Pedro Rodríguez de Campomanes ( <i>Respuesta accounting sobre abolir la tasa y establecer el comercio de granos</i> , 1764), Manuel de Zubiaur ( <i>Opúsculo de teologíamoral</i> , 1716), Pedro de Calatayud ( <i>Doctrinas practicas</i> , 1739), Jose María Uría de Nafarrondo ( <i>Aumento del comercio con seguridad de conciencia</i> , 1785)

注：<sup>1</sup> 括号内的文字和数字表示出版物的标题和出版年份。

\*表示门格尔在其《原理》中引用了该出版物。

### 3. 穆瑞·罗斯巴德

他的贡献是综合了格莱斯-哈钦森、雷蒙德·德·罗弗（Raymond de Roover）

<sup>1</sup> 译者注：博士（Doctor）这个词的起源就是中世纪的教会，当时天主教把一批对早期教会知识传承与理论发展有贡献的作者奉为“教会圣师（Doctor of the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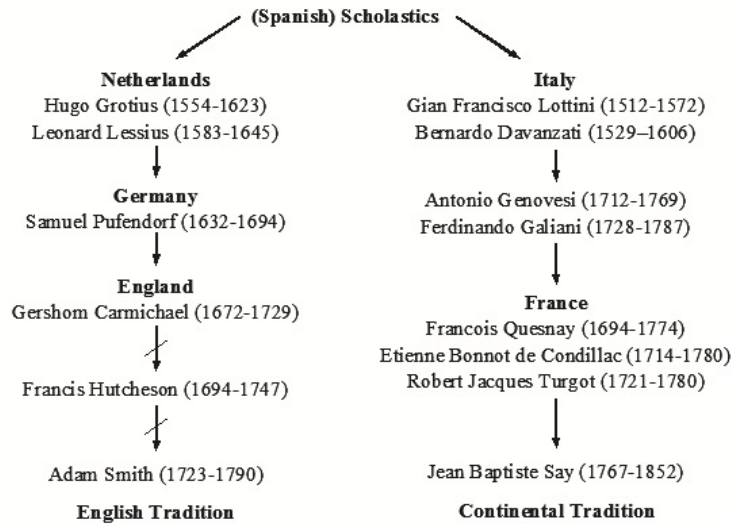
和埃米尔·考德（Emil Kauder）的研究。他强调经院哲学思想中高水平的经济知识，这在萨拉曼西亚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中达到顶峰。例如，Rothbard (2006c [1976]) 写了他们对价值理论的贡献：“但正是 16 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发展了纯粹主观的支持自由市场的价值理论。”与韦尔塔·德索托相比，罗斯巴德对西班牙经院哲学的立场更为温和。他确定了所有经院哲学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重视西班牙经院哲学：

近几十年来，修正主义学者明显改变了我们对奥地利经济学派史前史的认识。我们看到，出现了一种原初奥地利学派经院哲学经济学的悠久而强大的传统，它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和后来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然后影响着法国和意大利经济学家，直到亚当·斯密时代。卡尔·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成就与其说是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体系，不如说是复兴和阐述了被古典学派抛弃的旧传统（Rothbard 2006c [1976]）。

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在该问题上使用的模棱两可的术语存在问题。“复兴和阐述”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罗斯巴德没有在这一点上进一步详细说明。尽管上述段落表明他相信对门格尔的学术影响，但他仅将这种影响追溯到萨伊，而没有继续追溯到门格尔（比较图 1）。总的来说，罗斯巴德（和格莱斯-哈钦森）的观点中存在一个英国传统和一个大陆传统。英国的传统弄错了。它虽然受到经院哲学思想的影响，但转向了劳动价值论，为卡尔·马克思铺平了道路。荷兰人格老秀斯（Grotius）和莱修斯首先受到西班牙人的影响，后来在其作品中经常引用他们。格老秀斯的教义被德国路德教法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所采纳。不幸的是，普芬道夫放弃了对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许多引用（Rothbard 2006c [1976]）。因此，当卡迈克尔（Carmichael）将普芬道夫的著作翻译成英文时，有关经院哲学痕迹的知识就丢失了。哈奇森（Hutcheson）是卡迈克尔的学生，他的学生亚当·斯密最终放弃了经院哲学对价值理论的学术影响。大陆的经济学家保留了这种可以追溯到亚里多德的经院哲学传统。意大利人洛蒂尼（Lottini）、热诺维西（Genovesi），尤其是加利亚尼，他们在价值论上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受到西班牙人的影响。“从加利亚尼那里，效用、稀缺性和对市场的普遍估计的核心作用传播到了法国”（Rothbard 2006c [1976]）——即孔狄亚克、杜尔哥和魁奈。孔狄亚克和杜尔哥随后影响了萨伊。简而言之，文献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西班牙）学者和门格尔之间存在联系——可能除了科瓦卢比亚斯的引述之外，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它。

图 1

ROTHBARD (2006C [1976]) 对罗弗、考德和格莱斯-哈钦森的综合



#### 四、门格尔的“缺失环节”

在他们的历史性著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中，舒拉克和安特克夫勒 (Schulak/Unterköfler) 批评韦尔塔·德索托没有为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影响门格尔的论文提供足够的证据。用他们的话说：“韦尔塔·德索托也因其理论而闻名，即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应被视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他还没有提供学术传统和门格尔之间关键的‘缺失环节’” (Schulak/Unterköfler 2011 [2009], 176)。除了在《原理》中引用科瓦卢比亚斯的话，门格尔和西班牙经院哲学之间真的没有直接联系吗？关于门格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来源：他的经济著作和他的图书馆。让我们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有关的参考资料或书籍。

##### 1. 门格尔著作中的参考文献

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处参考文献。门格尔在其《原理》的第八章“货币理论”中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

这些小册子【“中世纪和十六世纪极其丰富的文献”】主要关注铸币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关于君主们改变硬币金属含量的的权利的存在和限度问题，以及这些改变对公共财富的影响。由于政府经常滥用铸币，这个问题变得很重要。在此背景下，几位作者也借此机会讨论了货币的起源问题，他们根据古代作家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经常参考亚里士多德。参见 (……) Didacus Covarruvias, *Veterum numismatum collatio*, 同上，第 648 页；(……)。<sup>2</sup>总结这些作者的研究路线，他们几乎总是从展示纯以货易货所带来的困难开始。他们接下来展示了如何通过引入货币来消除这些困难。在进一步的论证过程中，他们强调了贵金属作为货币的特殊适用性，最后，他们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得出结论，贵金

<sup>2</sup> 《古钱币对比》(*Veterum numismatum collatio*) 是一项关于 15 世纪西班牙马拉维迪人购买力下降的研究，其中包含许多价格统计数据 (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0)。



属实际上是通过人的立法而成为货币的。（……）无论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在反对君主们滥用铸币方面的功绩如何，就货币的起源问题而言，他们并没有因此改进古代的观点（Menger 2007 [1871], 316-7；强调为原文）。

门格尔不以为然地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并得出结论说，他以及该时期的其他六位作者并没有改进货币起源的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是通过法律或公约产生的，并且不会在社会中自发发展。门格尔并不符合希腊哲学家和科瓦卢比亚斯的这一立场。此外，他引用科瓦卢比亚斯的理由不是主观价值，而是货币的起源。如果门格尔会认为科瓦卢比亚斯对主观价值的贡献很重要，那么他为什么不引用他的话？考虑到在门格尔所属的知识环境中，正确和广泛的引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尤其奇怪。他似乎不太可能不提及一位“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好地表达了主观价值理论的本质”的16世纪经济学家（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29）。特别是因为德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称赞门格尔的《原理》“对经济思想史的透彻了解”（Roscher 1874, 1040）。在这种情况下，科瓦卢比亚斯的引述成为反对萨拉曼卡和维也纳之间联系的证据。<sup>3</sup>

庞巴维克在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第一章中也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其中他谈到了“对利息的反对”。在那里，庞巴维克详细阐述了反对利息获取的论点。庞巴维克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赤裸的观点开始，即货币本身没有生产力，因此从货币中赚钱是不自然和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引用了重新阐述这一论点的科瓦卢比亚斯：

科瓦卢比亚斯说得更直截了当：“第四个理由是货币本身不会生殖，也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拿走超过借出金额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可接受和不公平的，因为这与其说是取自不生息的货币，不如说是取自他人的勤劳”（Böhm-Bawerk [1884] 1890, 22）。

很明显，庞巴维克不同意这种观点。利息是因为人们对现在财货的评价高于未来财货。取缔利息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资本与利息》的第一本书中，我们有了个赞成的引述，它是关于利息观念的历史的。和门格尔一样，庞巴维克最有可能引用科瓦卢比亚斯来展示他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知识。庞巴维克在高利贷（usury）问题上第二次引用西班牙人的话。科瓦卢比亚斯现在提出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以下反利息论点：有些东西的用途在于消费它们，例如红酒或面包等物品。因此，这些物品的使用不能与其消费分开，如果出售了物品的使用，物品本身也必须转让。换言之，禁止分开销售面包及其用途。这同样

---

<sup>3</sup> 如果门格尔不知道其中包含他的主观价值理论的科瓦卢比亚斯的作品，那将指向 Hülsmann (2007, 111-2) 在其米塞斯传记《米塞斯大传》（*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中所写的：“门格尔提出的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大量依赖于一个古老价格理论的残存思想，这一传统来自萨拉曼卡的后期经院学派，他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曾强调过定价过程的主观特性，这显然是英国古典学派未曾考虑过的。不过，西班牙后期经院哲学家从未专门撰文探讨经济学，他们对价值和价格本质的揭示，散落于卷帙浩繁的文献之中。”当许尔曼写道门格尔“依赖于”萨拉曼卡学派主观价值理论的“残存思想”时，他似乎相信其中的联系。但他也强调，西班牙人的知识“散落于卷帙浩繁的文献之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没有遇到科瓦卢比亚斯的主观价值理论。

适用于信用合同中的货币：债务人必须偿还借来的款项，以及使用同一笔款项的钱，这意味着他为一件事支付了两次费用（Böhm-Bawerk 1890 [1884], 22）。科瓦卢比亚斯将这一论点表述如下：

为物品本身的使用和物品本身而获取任何利润是不公正的，并且交易是欺诈性的，因为不该被计价的东西被出售了……因为要么债权人获得了他自己部分的利润，因此他收到了两次估价，要么他收到了该部分的不公正价值。如果为了使用一件物体，它们不能与部分分开估计，并因此让同一部分被出售两次（同上；自己翻译）。

再一次，庞巴维克不同意这种反对高利贷的论点。这两句话都来自《各种决议》（*Variorum Resolutionum*），这不是门格尔在他的《原理》中引用的作品。总的来说，我们发现了三次不赞成科瓦卢比亚斯的引用：一次在门格尔那里，两次在庞巴维克那里。没有一次是关于主观价值论的。

## 2. 卡尔·门格尔藏书<sup>4</sup>

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门格尔可能是奥匈帝国收入最高的人之一。Streissler (1990a, 62-3) 估计，以 1990 年的购买力计算，以相对收入计算，门格尔的工资为 500000 美元——而且门格尔不必缴纳很多税款。正如施特莱斯勒所说，“因此，专业教席不仅是非常受尊敬的职位，而且也是德语世界中薪酬最高的职位之一”（同上，63）。这笔巨额薪水解释了为什么门格尔可以积累起一座藏书超过 25000 册的图书馆（Schulak/Unterköfler 2011 [2009], 32）。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的第一版都是这个图书馆的一部分，书中的大量评论向我们展示了门格尔的思想演变。门格尔于 1921 年去世后，他的遗孀赫敏·安德曼（Hermine Andermann, 1864-1924）向日本东京的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出售了大约 19100 卷。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曾两次出现在一桥大学的卡尔·门格尔藏书中。路易斯·德·莫利纳有一篇作品，标题为《路易斯·莫利纳对皮杰·昆蒂评估的最后评论和解释》（*Ludovici Molinae nouissimis commentarijs, & interpretibus ad bullam Pij Quinti de censibus*）。该标题表明这篇著作与经济学无关。它出现在一本名为《评估论文》（*Tractatus de censibus*）的书中。这本书还包含卢多维库斯·岑奇（Ludovicus Cenci）和乔瓦尼·巴蒂斯塔·莱昂内利（Giovanni Battista Leonelli）的文本。本书于 1629 年在威尼斯出版，由三卷组成（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16a）。科瓦卢比亚斯出现在一本名为《货币的各种有用处理》（*Tractatus varii atque utiles de monetis*）的书中。这本书是关于经济学的。科瓦卢比亚斯是 11 位作者之一，他的贡献是《以下两段关于铸币厂，取自迭戈·科瓦卢比亚斯·莱瓦的实践调查

---

<sup>4</sup> 我们在卡尔·门格尔藏书中研究了以下西班牙学者：Diego de Covarrubias y Leyva、Luis Saravia de la Calle、Juan de Lugo、Juan de Salas、Castillo de Bovadilla、Luis de Molina、Martín de Azpilcueta、Juan de Mariana。这些是 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29-37) 提到的名字。我们还查找了 Murray Rothbard (2006a [1995], 99-133) 提到的所有学者：Francisco de Vitoria、Domingo de Soto、Juan de Medina、Tomás de Mercado、Francisco García、Domingo Báñez、Francisco Suárez。

书》（*Sequuntur Duo capita ad rem monetariam pertinentia desumpta ex libro practicarum quæstionum D. Didaci Couuarruias à Leyna*）。门格尔和庞巴维克似乎都没有引用该文本。这本书于 1574 年在科隆出版，共八卷（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16b）。

结果是：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写的两本书不是专著，而是与其他两到十位学者合写的文本集。这并不多。这两本书约占卡尔·门格尔藏书的 0.01%。<sup>5</sup>将它们与以下数字进行比较：奥雷姆（Oresme）的 2 本，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的 3 本，格老秀斯的 5 本，但丁（Dante）的 7 本，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的 7 本，维塞尔（Wieser）的 21 本，施穆勒（Schmoller）的 21 本，亚当·斯密的 29 本，庞巴维克的 33 本和卡尔·马克思的 37 本。有趣的是，门格尔拥有《国富论》的许多不同版本和译本。<sup>6</sup>只有 17 本书是用西班牙语写的，14 本书从西班牙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也说明了缺失的环节。这 31 本西班牙书籍占馆藏的 0.19%。西班牙语甚至仅排在第 9 位，在匈牙利语（42 本）和俄语（38 本）之后。大多数书籍是德语（54%），其次是法语（19%）、英语（17%）和拉丁语（4%）。因此，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或西班牙文献在藏书中几乎不存在。门格尔知道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一些作品，但可能并不认为它们很重要。<sup>7</sup>让我们看看是否有证据表明通过德国经济学这样的传播者产生了间接影响。

## 五、门格尔与德国经济学

“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无法解释和无缘无故——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出现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学中”（Streissler 1990a, 31）。这是约瑟夫·熊彼特在 1914 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话。他是埃里希·施特莱斯勒（同上）所谓的“神话”的主要来源者之一：奥地利学派独立于德国经济学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很容易证明，德国经济学的书籍很少预示着门格尔《原理》的基本思想”（同上）。下面，我们将展示德国经济学家如何预见和影响了门格尔。之后，我们考察他们是否受到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影响。

### 1. 门格尔思想的德国渊源

在 20 世纪 10 年代，熊彼特对老德国经济学家没有太多积极的评价。他在 1914 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关于这些，我们无需多说。不是说他们写得很少；不是说时不时地在其中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些书中没有精神流动”

---

<sup>5</sup> 卡尔·门格尔藏书中有 16108 本书籍或其他著作。有些书籍由不同的卷组成，因此总卷数约为 19100。

<sup>6</sup> 门格尔拥有 1776 年、1778 年、1784 年、1786 年、1789 年、1799 年、1811 年、1817 年、1828 年、1893 年和 1896 年出版的 11 个英文版《国富论》。这些版本包括前五个英文版。门格尔还拥有 1776-8、1796-9、1799、1810、1846-7 和 1861 年的六个德文版本以及 1788、1794 和 1800-1 年的三个法文版本。共 20 版，共 69 卷。这些版本远远多于 Say 的 *Traité* 和 *Cours*（各 7 本）、李嘉图的《原理》（5 本）、劳的 *Grundsätze*（3 本）或孔狄亚克的 *Le commerce*（2 本）。即使是门格尔原理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书，罗雪尔《系统》的第一卷，也只出现了 12 次。至少在罗雪尔的教科书上，门格尔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版本。第 25 版德文出版于 1918 年——门格尔去世前三年——还有英文和法文译本。

<sup>7</sup> 不过，杜克大学的卡尔·门格尔文件中可能有一些东西。

(Streissler 1990a, 41)。维塞尔甚至指出,诸如需求、财货、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等概念在德国教科书文献中是“空盒子”(同上,40)。这些观点通常基于对德国历史,尤其是对经济思想史的误解。正如 Streissler (同上,31-2) 在他的杰出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施穆勒和年轻的历史学派在 1871 年普鲁士主导的中央国家崛起后声名鹊起。在此之前,德国在政治上更加分散,在思想上由较小的独立国家的大学主导。例如巴登的海德堡或弗莱堡、巴伐利亚的慕尼黑、符腾堡的图宾根和萨克森的莱比锡。正是在这些大学中,老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胡费兰 (Hufeland, 1760-1815)、劳 (Rau, 1792-1870)、赫尔曼 (Hermann, 1795-1868) 或罗雪尔 (Roscher, 1817-94)。<sup>8</sup>例如,慕尼黑大学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教授赫尔曼意识到价格决定成本:

即使我们愿意完全抛开大量的价格决定因素——我们认为它们与生产成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仍然会发现,即使对于那些定期以任何所需数量进入市场的财货,价格也是正如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所教的那样,绝不是由成本决定的。事实上,在所有情况下,决定价格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需求,其主要根源是使用价值和购买者的支付能力。从需求和需求者愿意为某种财货出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愿意为了想要的财货放弃多少财货,这决定了最低报酬生产的成本可能有多高 (Hermann 1832, 95)。

早在 1832 年,他就在他的巨著《国家经济调查》(*Staatswirth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中题为“价格变化对成本的影响”的一节中写下了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指出,需求表明消费者愿意为所需财货放弃的财货数量,这反过来又决定了最低报酬生产的成本,这与维塞尔的机会成本论非常相似。正如 Streissler (1990a, 42) 所解释的那样,这一论点在赫尔曼之后的德国文献中被广泛使用,甚至在 1832 年之前就被采用了。德国经济学家也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卡尔·海因里希·劳 (Karl Heinrich Rau, 1792-1870)——海德堡的教授和年轻的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克一世的老师——将企业家视为第四种生产要素。这与奥地利学派理论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强调非常相似。根据劳的说法,企业家精神包括“各种要素的组合,制定最有利的使用计划,并由他的助手监督该计划的执行”(同上,52)。此外,企业家应就“全部损失或至少损失部分成本的危险”获得补偿,尤其是由于“预测未来价格水平的难度或大或小”(同上,52)。

可以肯定地说,卡尔·海因里希·劳超越了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组合的新古典主义概念,并暗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sup>9</sup>戈特利布·胡费兰 (Gottlieb Hufeland) 同样认为,企业家获得的收入不同于土地、劳动力或资本方面的收入。这位胡费兰——法学教授、但泽市市长——也是德国主观主义和主观价值的权威。他写道,“所有的财货都只是凭借一个人或几个人用它们自己创造的思维图景而成为财货”(Hufeland 1815 [1807], 17), 并且“在财

---

<sup>8</sup> Winkel (1977, 101-4) 区分了较年轻的和较老的历史学派。Streissler (1990a, 32) 同样区分了“施穆勒学派”和“老人们”,也就是赫尔曼、劳和罗雪尔。甚至宁愿看到奥地利经济学和德国经济学之间没有联系的米塞斯 (Streissler 1990a, 40-1; Gabriel 2012, 38) 也将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和克尼斯 (Knies) 称为“老【历史】学派的拥护者” (Mises 1990 [1962], 43)。

<sup>9</sup> 关于 19 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及其企业家理论,参见 Streissler (1989)。

货和财富领域存在绝对的意见主权”（同上,19），因此“成为财货的东西（……）虽然主要由劳动制造，但不会因为劳动而成为财货”（同上,32）。胡费兰不是在1850年，而是早在1807年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艺术的新基础》（*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hschaftskunst*）中写下了这些句子。毫不奇怪，施特莱斯勒认为他是“德国经济学中经常被引用的主观主义经济概念的首位作者”（Streissler 1990a, 42）。

这种主观主义观点在德国文献中根深蒂固。阿尔伯特·夏弗勒（Albert Schäffle）在1867年对价值的解释如下：“价值【是】人的意识中所有财货之间的关系（……）【它】主要具有主观性”（Schäffle 1867, 52；强调为原文）。夏弗勒是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前任，可能会担任他的职务裁判，但在1871年成为贸易部长（Streissler 1990a, 34）。威廉·罗雪尔——门格尔将其《原理》献给了他——将财货定义为“已知对满足人类真正需要有用的任何东西”（Roscher 1843, 2）。赫尔曼将需求定义为“要努力解决它的缺乏感”（Hermann 1874, 5）。基于这些主观主义洞见，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 1821-98）在1855年意识到只有通过反向评值才能进行交换：

交换的前提是，对于有关个人而言，使用相同数量的财货的价值具有不同的大小。交换的发生不是因为两种财货的两个数量相等，而是因为它们的两边以相反的方式被认为是不等的（Knies 1855, 467）。

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根据 Streissler (1990a, 44) 的说法，劳之前已经提出过它。克尼斯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还是学生时，在他的研讨会上发表了边际主义论文（Streissler 1990a, 34-5）。德国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学说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罗雪尔在提到孔狄亚克时将劳动价值论称为“英国观点”（Roscher 1864 [1854], 200）。卡尔·马克思随即用以下的话抨击罗雪尔：“正是因为孔狄亚克对交换价值的本质一无所知，他才被威廉·罗雪尔教授先生选为合适的人选，为他自己幼稚观念的合理性负责”（马克思 1909 [1867], 177-8）。德国经济学家还发现了许多边际概念。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 1812-78）是1848年第一个阐述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人：“有用商品的数量增加得越多，只要需求没有改变，每个价格的效用就会减少得越多”（Hildebrand 1848, 318）。门格尔知道这句话，因为他在他的《原理》中引用并批评了希尔德布兰德书中的后续句子，并将它们称为“对调查的无与伦比的推动力”（门格尔 2007 [1871], 297）。在 Mangoldt (1863, 48) 和 Roscher (1864 [1854], 10) 中也可以找到递减的边际效用。德国经济学家还认识到，行动者倾向于使他们拥有的财货的边际效用相等。门格尔在布拉格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米舍勒（Peter Mischler, 1821-64）表达了这种见解如下：

每个人都不会为特定的需求购买超过他从理性的角度可以使用的某种财货（……）如果他有剩余（……）他会尝试将其用作一种手段换取另一种财货（Mischler 1857, 231）。

德国经济学中还存在更为复杂的边际概念。卡尔·沃尔夫冈·舒兹（Karl Wolfgang Schüz, 1811-75）暗示了边际价值产品的要素定价：

服务的价格是根据价格形成的一般规则确定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看劳动的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是由根据其结果支付工资的人所认为的。这个结果越能满足他的要求和欲望，劳动对他来说就越有价值，并且在最大的情况下（最高价格）为它付出的代价也越大。因此，在任何企业中，工资都是由（1）劳动生产力的程度和在劳动者合作下从事的职业的报酬决定的（Schüz 1843, 286）。

Hermann (1832, 281)也暗示了边际要素定价，Roscher (1897 [1854], 481)说：“在每个生产企业（以及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中！），最后被雇用的工人所生产的额外产品，对于和他一样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国经济学家也部分预测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Schäffle (1867, 214-9) 尤其将危机归因于利率的变化和从未经历过危机的几代人缺乏信息。Streissler (1990a, 61-2) 甚至就洛伦兹·冯·斯坦（Lorenz von Stein）教科书的一章中写道：“惊讶的读者已经在相当长的篇幅中看到了所谓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即信贷的扩张和收缩（227-28）！”实际上，洛伦兹·冯·斯坦并没有将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市场利率确定为商业周期的原因。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出了一个非常奥地利式的结论：

因此，贸易危机的原因在于让销售收入停止的原因。由于销售收入受销售影响，销售不足成为危机的首要原因。然而，这种缺乏的原因是由于生产突然比消费增长更快，因此一部分产品变得无法销售。生产突然增加的原因在于企业资本的突然增长；既然是信贷产生的，那么信贷的突然增加，除了利率，也是贸易危机的原因。因此，功劳既是进步的源泉，也是危险的源泉（Stein 1858, 228）。

这是在米塞斯首次提出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 50 多年前的一次非凡声明。斯坦因清楚地意识到信贷扩张的危险。他将危机描述为过度投资危机，在此期间“生产突然比消费增长更快”。这是由于“信贷产生的”企业投资增加所致。因此，信贷和利率是经济周期的原因。第六，德国经济学家在相同的理论供需框架中分析了所有价格（Streissler 1990a, 47）。换句话说，他们有一种原始奥地利的一般价格理论。许多德国经济学家和门格尔一样，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提出了孤立的交换和单边竞争的观点。这对罗雪尔来说是正确的，他赞扬了门格尔对价格理论的处理（Roscher 1874, 1040）。德国经济学家甚至预示了米塞斯的论点，即在社会主义下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希尔德布兰德早在 1848 年就以“所有社会主义组织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为题写道：

此外，由于个人的劳动能力、才能和需求在任何地方都不同，任何分配和调节规律都以存在绝对衡量个人对生产和消费的贡献为前提。然而，这样的衡量标准既没有被发现，也不可能，因为这些贡献是个体的，也就是说，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是无限多样的，因此不能客观地衡量（Hildebrand 1848, 265）。

希尔德布兰德认为，在没有货币价格的情况下，个人对生产的贡献是“无法客观衡量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分配和通融的规律。夏弗勒甚至预见到了

计算问题（Braun 2016, 134）。他在 1870 年写道：

货币和货币经济所产生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精确的、同质的价值计算之上的，对于整个经济过程，只有用货币才能完成。（……）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社会同质的估值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最高程度的效率（即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经济和妥善的管理）也是不可能的（Schäffle 1870, 398）。

任何消除货币使用的社会都将失去“所有稳定的价值标准”，并且将“没有任何关于经济方向的线索”（Schäffle 1870, 401）。米塞斯至少知道舍夫勒的作品，因为他在第一版的《社会主义》中引用了其中两部作品（Mises 1922, 124 & 163）。简而言之，德国经济学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关键见解，具体来说：第一，价格与成本之间的正确关系（赫尔曼）；第二，强调企业家精神（劳，胡费兰）；第三，具有主观价值理论的彻底主观主义（胡费兰，舍夫勒，罗雪尔，克尼斯）；第四，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希尔德布兰德、曼戈尔特、罗雪尔）和其他边际见解（希尔德布兰德、米舍勒、舒兹、罗雪尔）；第五，原初奥地利学派价格理论（罗雪尔）；第六，对商业周期的部分理解（斯坦，舍夫勒）；以及最后，社会主义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希尔德布兰德，舍夫勒）<sup>10</sup>。罗雪尔在 140 多年前写道：“德国经济学至少与外国任何经济学相同”（Roscher 1874, 1011）似乎是正确的。因此，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德国经济学家是否也影响了门格尔？谁能比门格尔本人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令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里所讨论的领域，包括我们的科学中最普遍的的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最近发展的真正产物，而且，这里所尝试的对我们的科学的最重要的原理的改革，因此基于以前的工作——它们几乎完全产生自德国学者的勤勉。因此，我愿本书被视为来自奥地利的一位合作者的友好问候；德国通过她派给我们的众多杰出学者和优秀出版物向我们奥地利人如此慷慨地提供的科学建议，我也愿本书被视为对其的微弱响应（门格尔 2007 [1871], 49）。

这是卡尔·门格尔在介绍他的《原理》时，称自己为德国学者的“合作者”，他的原理是德国科学建议的“微弱响应”。请注意，他认为这些原则是基于“以前的工作——它们几乎完全产生自德国学者的勤勉”。顺便说一句，除了一次提

---

<sup>10</sup> 我们必须指出，突出德国人的所有预示超出了这项工作的范围。尽管如此，德国经济学家预示或影响门格尔的两个重要领域仍然存在，即货币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Gabriel (2012, 58) 认为，德国老经济学家，尤其是卡尔·克尼斯，提出了米塞斯货币理论的要点。克尼斯撰写了 1000 页的论文《货币与信用》（*Geld und Credit*, 1873-9），被米塞斯称赞为“关于货币和信用的杰出著作”（Mises 1990 [1962], 39）。Gabriel (2012, 58) 认为德国对货币理论的许多贡献都是从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到米塞斯的。在经济自由主义方面，门格尔——用 Streissler (1990b, 110) 的话说——是“最纯的古典自由主义”。一些老德国经济学家也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的追随者。Schüller (1899, 43) 确定了克劳斯、洛茨、雅各布、尼贝纽斯和劳。劳的《原理》也是“主要教科书”（Streissler 1994, 6），门格尔在他对王储鲁道夫的经济政策讲座中使用了它，而框架和大多数论点来自《国富论》（同上）。Winkel (1977, 20; 自己的翻译) 在他的 19 世纪德国经济学史中评论道：“一般来说，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在 19 世纪头二十年间在德国如此广泛传播，人们可以说它是‘统治学说’”。关于经济自由主义、门格尔和 19 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参见 Streissler (1997, 73-85)。

到奥地利民法典和奥地利货币，这是他在书中仅有的两次提到奥地利（人）（Streissler 1990a, 33）。另一方面，“德国”、“德国人”或“德国人”的贡献被提及不少于 23 次（同上），包括在以下段落中：“仅在德国作者那里找到对使用价值度量问题的更深入处理”（Menger 2007 [1871], 297）。或者：“也许没有什么比对比德国和英国作家对价值理论的处理更能揭示出德国人对经济学的哲学渗透的倾向和英国人的实践意义了”（同上，307）。

此外，门格尔主要引用德国经济学家的话。表 2 显示了他的《原理》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十位作者。可以看出，五位是德国人，且第一和第二名被德国人占据。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孔狄亚克和杜尔哥也经常被引用。卡尔·门格尔藏书包含了罗雪尔的大部分书籍，只有赫尔曼和亚里士多德的书籍数量是个位数。Streissler (1990a, 35) 报告说，英国作者很少被门格尔引用，而德国作家如劳或罗雪尔更频繁地引用英国和非德国作者。Streissler (1990a, 38) 总结道：“因此，门格试图将自己与德国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这与英国甚至他的母国奥地利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德国经济学家非常积极地接受门格尔。罗雪尔将他的经济思想史中的四行献给了他，这些思想史于 1874 年问世（仅在门格尔的《原则》之后三年）。他认为门格尔是“那些在赫尔曼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经济学家”之一（Roscher 1874, 1039），并称赞他“他的分析非常抽象，总是独创且经常富有成果”（同上，1040）。这是一个高度赞扬，并被用作门格尔被任命为正教授的理由。<sup>11</sup>维塞尔也承认门格尔受到德国经济学的影响：“人们通常忽略了，老的【！】德国理论已经以重要的方式为门格尔的《原理》做好了准备”（Streissler 1990a, 40；强调为原文）。他甚至将门格尔描述为“从老的德国经济学的土壤中萌芽”（同上；自己的翻译）。因此，总而言之，德国经济学似乎是对门格尔影响最大的因素。奥地利学派及其主观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正如 Streissler (1997, 73；自己的翻译) 所说——是对 19 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的“重新吸收和延续”。如果门格尔接受了西班牙的价值学说，其影响力肯定已经遍及德国。

表 2

根据 STREISLER (1990A , 34-5)，在《原理》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10 位作者

排名	作者	引用次数	卡尔·门格尔藏书 中的书籍数量
1	罗雪尔	17	46
2	赫尔曼	12	7
3	亚当·斯密	11	29
4	夏弗勒	10	27
	让-巴蒂斯特·萨伊	10	25
5	克尼斯	9	11
	亚里士多德	9	4
6	孔狄亚可	8	22
7	劳	7	23

<sup>11</sup>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个人档案中的引述如下：“罗雪尔本人，目前是经济学领域的一流权威之一，在他的《德国经济史》（*Gesch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 Deutschland*）中特别赞赏地提到了门格尔”（Streissler 1990a, 38；强调为原文，自己的翻译）。



	杜尔哥	7	10
--	-----	---	----

## 2. 西班牙和德国之间的联系？

长话短说：似乎没有影响。在罗雪尔的《经济体系》（*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1854）中，只有三处引用了胡安·德·马利亚纳。《原理》中至少引用过两次的所有其他德国作者均未引用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批评家现在可能会说：“只有三处引用？这么少，你一定是忽略了什么！”这里有一些事实真相。用于关键词研究的德语教科书可能没有适当地数字化。另一个问题可能是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名字中有一些未知符号。比如说，Menger (1871, 257) 所用的是“Couarouvia”。然而，我们经常寻找的不是全名，而是“Azpil”或“Cova”等缩写。许多较短的文章是通过对文本和脚注的目视检查来控制的。此外，我们可以找到 Roover (1974, 334) 和 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0) 在意大利文献（在加利亚尼和达万扎蒂）中发现的对科瓦卢比亚斯的引用。如果这种方法适用于意大利人，为什么它不能适用于德国人？罗雪尔引用了马利亚纳，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罗雪尔是思想史专家，拥有“无与伦比的思想史知识”（Streissler 1990a, 53）。他那长达 1000 页的德国思想史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也知道并引用了 16 世纪的西班牙学术文献，这似乎是合理的。此外，罗雪尔在其 1000 页的历史中再次仅引用了马利亚纳的《论国王》（*De rege*），而没有提及其他西班牙经院哲学家。<sup>12</sup>如果我们的西班牙作家影响了德国经济学家，罗雪尔不太可能在本书中不提及西班牙的影响。因此结果实际上可能是准确的，仅此而已；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不要对它们进行过多的解释。

表 3 显示了门格尔在其《原理》中至少两次引用的所有德国经济学家。这些是 16 位德国经济学家的 26 本书或期刊文章。不包括被引用少于两次的所有德国人。因此，表 3 展示了德国经济学的名人录。每位重要的思想家，如劳、克尼斯、罗雪尔、赫尔曼或胡费兰都在其中。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德国教科书文献样本。我们的样本包括劳的教科书《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26）。这本书与门格尔的《原理》同名。这是门格尔在准备他的任教资格（habilitation）时首先转向的其中之一，如他日记中的以下条目所示：“1867 年 9 月。投入到政治经济学。学习了劳，等。部分是自由学习，部分是在辩论（*Debatte*），后来读了日报（*Tagespresse*）”（Yagi 2011, 33; 强调为原文）。如果这个样本中的引用很少，那么其他德国文献中可能也很少引用。我们得到的引用次数与施特莱斯勒给出的数字相似。主要区别在于，施特莱斯勒给出的（1）对夏弗勒的引用是 9 次而不是 11 次，（2）对赫尔曼的引用的是 12 次而不是 9 次。

如前所述，可以在罗雪尔的《经济体系》（1854）中找到对马利亚纳的《论国王和国王的机构》（*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 1599）的三次引用。《论国王》包含对弑君的辩护，在亨利四世被暗杀后在法国被烧毁（Rothbard 2006 [1995], 1179）。《体系》是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的主要经济教科书。直到 1922 年，它的六卷本共出版了 26 个版本，其中包括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的版本（Streissler

<sup>12</sup> 罗雪尔的历史是通过对作者索引的目视检查来控制的。

1990a, 52-3)。这本书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克尼斯痛苦地指出罗雪尔的引用可能会成就或损害一位德语经济学家（Knies 1883, iv）。《体系》是《原理》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14 次）。<sup>13</sup>第一处引用可以在标题为价格战（Preiskampf）的第 100 段中找到：

Xenoph. De vectigg. 4. 的一个非常野蛮的价格理论。古人在这方面没有多大进展，虽然不乏对个别价格过程的敏锐观察：比较 *Aristot. Oecon.* II. *Cicero De off.* III, 12 ff. *Mariana 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 (1598) III, 8 通过价值和数量的比率来解释价格（Roscher 1864 [1854], 191；强调为原文）。

罗雪尔没有进一步深入细节，而是在洛克（Locke）的价格理论中继续前进。基本上罗雪尔必须与马利亚纳一致，因为他在同一段中写道：“商品的供大于求，价格越低；供大于求，价格就越高”（Roscher 1864 [1854], 189）。第二处引用位于第 114 段，标题为例外（Ausnahmen）。“例外”是指不受阻碍的市场上的价格形成产生“对整个商业的干扰”的情况（Roscher 1864 [1854], 211）。税收可以解决这些由于“国家特权”而可能发生的干扰（同上）。罗雪尔在这种情况下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过度喜欢税收的思想家发表了评论：

对政府税收的偏好很奇怪，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最伟大的权威人士，尤其是德国的权威人士都表达了这一点：Luther Vom Kaufhandel und Wucher (1524)；Calvin (Leben Calvins von Henry, II, 补充 3, p. 23)；*Bornitz De rerum enoughia*, 1625, p. 246；v. Seckendorff *Deutscher Fürsten staat*（第 5 版，1678），p. 210；Becher II, p. 1823 ff.；Horneck, *Oesterreich über Alles, wenn es will* (1684), p. 123. 同样，*Mariana 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 III, 9.（但比较 III, 8）（Roscher 1864 [1854], 212；强调为原文）。

正如“奇怪”一词所表明的那样，罗雪尔不赞成马利亚纳州的税收处理。然而，他似乎更符合它们在第 8 章中的处理（“但比较 III, 8”）。该参考文献的内容确实很奇怪，因为马利亚纳通常被描述为“学识渊博的极端主义者”（Rothbard 2006 [1995], 117）和“也许是所有经院哲学家中最自由主义的人”（Huerta de Soto 1999, 2）。在这段话中，更大的极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似乎是罗雪尔。最后一处引用可以在第 231 段中找到，标题为繁荣时期的奢侈品（Luxus blühender Zeiten）：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很好地区分永久性财货和易腐烂财货中的奢侈品；第一种不太可能使个人或整个国家陷入贫困，而是倾向于节俭。同样，*Isocrates ad Nicocl.* p. 19. *Livius XXXIV*, 7；*Plin. H. N. XIII*, 4；*Mariana* (1598) *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 III, 10 (Roscher 1864 [1854], 471-2；强调为原文)。

---

<sup>13</sup> 门格尔引用了 1857 年版（2 次）和 1868 年版（12 次）。我们引用 1864 版是因为 1868 版不可用。在 1857 年和 1864 年的版本中，这三处引用都是相同的。

罗雪尔赞许地引用了马利亚纳。Roscher（同上，471）在正文中指出，如果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均，消费将被转移到“虚荣”、“快速”和“不道德”的需求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了亚当·斯密及其前辈的观点。最后，罗雪尔在他的德国经济思想史中曾两次提到《论国王》。两处引用都指同一章并表达相同的想法，因此我们将自己限制在第一处（和更广泛的）引用中：

回想一下此时的西班牙人，马利亚纳希望对外国商品征收高税，以减少流出该国的资金，并让外国工匠通过搬迁到西班牙同时增加其福利（*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 1598, III, 7. 10.）(Roscher 1874, 191; 强调为原文)。

这句话是不赞成的，又是关于税收的。罗雪尔在一篇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章中引用了马利亚纳。有趣的是提到马利亚纳的祖国西班牙。甚至罗雪尔也评论说，西班牙的经济思想在他写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总之，我们有两处赞成和两处反对的引用。它们都不是关于主观价值论的——在主观价值论上“我们的西班牙作家似乎做出了他们最持久的贡献”（Grice-Hutchinson 1952, 77）。

表 3  
在门格尔《原理》中被引用的德国经济学家

作者 (*- †)	被引用的作品 <sup>1</sup>	引用 <sup>2</sup>	参考西班牙经院哲学家
威廉·罗雪尔 (1817-1894)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I (1857, 1868), Grundriß zu Vorlesungen über die Staatswirtschaft (1843), Ansichten der Volkswirtschaft aus de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e (1861)	17 (1)	3
阿尔伯特·舍夫勒 (1813-1903)	Das gesellschaftliche System der menschlichen Wirtschaft (1867), Die ethische Sei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Theorie vom Werthe (1862)*, Die nationalökonomische Theorie der ausschließenden Absatzverhältnisse (1867)	11 (1)	0
弗里德里希·冯·赫尔曼	Staats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9 (2)	0

(1797-1868)	Vermögen, Wirthschaft, Productivität der Arbeiten, Kapital, Preis, Gewinn, Einkommen und Verbrauch (1832)		
卡尔·克尼斯 (1821-1898)	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cte (1853), Die nationalökonomische Theorie vom Werth (1855)*, Ueber die Geldentwertung und die mit ihr in Verbindung gebrachten Erscheinungen (1858)*	8 (2)	0
洛伦兹·冯·斯坦 (1815-1890)	System der Staatswissenschaft I (1852), Lehrbuch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 (1858)	6	0
卡尔·海因里希·劳 (1792-1870)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 I (1826, 1863)	4 (3)	0
约翰·F. E. 洛茨 (1771-1838)	Handbuch der Staatswirthschaftslehre (1837)	3 (3)	0
戈特弗利布·胡费兰 (1760-1817)	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hschaftskunst I/II (1807, 1815)	5	0
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 (1812-1878)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1848), Naturalwirthschaft, Geldwirthschaft und Creditwirthschaft (1864)*	4 (1)	0
赫尔曼·罗斯勒 (1834-1894)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64), Zur Theorie des Werthes (1868)*, Zur Theorie des Preises (1869)*	4 (1)	0
朱利叶斯·格拉	Die National-Oekonomie	4	0

夫·冯·索登 (1754-1831)	I/IV (1805)		
汉斯·冯·舍尔 (1839-1901)	Seiner historisch- ökonomischen Entwicklung 中的 Der Begriff des Geldes (1866 年) *	3	0
弗里德里希·卡 尔·冯·富尔达 (1774-1847)	Grundsätze der ökonomisch-politischen oder Kameralwissenschaften (1820)	2 (1)	0
约翰·亚当·奥伯 恩多弗 (1792- 1871)	System der Nationalökonomie (1822)	2 (1)	0
奥托·米凯利斯 (1826-1890)	Das Kapitel vom Werthe (1863)*, Die wirthschaftliche Rolle des Spekulationshandels (1864)*	2	0
约翰·格奥尔 格·布施 (1728- 1800)	Abhandlung von dem Geldumlauf II	1 (1)	0

<sup>14</sup>注：<sup>1</sup>罗马字母表示卷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门格尔引用的版本。

<sup>2</sup>括号中的数字表示门格尔在没有明确提及源材料的情况下提及作者的次数。

\*表示发表在“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编辑：希尔德布兰德）、“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编辑：劳）或“Vierteljahr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Kulturgeschichte”（编辑：朱利叶斯·福歇）的期刊文章。

### 3. 胡费兰从哪里借用了他的主观主义？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戈特弗利布·胡费兰是“德国经济学中不断被引用的关于主观经济概念的首位作者”（Streissler 1990a, 42），他受到了谁的影响？胡费兰和萨伊之间甚至可能存在联系，从而使西班牙经院哲学的知识从意大利传到法国、德国，最后传到奥地利？让我们从胡费兰在《政治经济学艺术的新基础》

<sup>14</sup> “被引作品”按被引次数排序（从高到低）。如果门格尔在一篇文章中重复引用同一本书，则视为一次引用。只有克尼斯是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因为门格尔连续四次提到他 1855 年的论文，这被算作两次引用。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控制了关键字搜索是否适用于 PDF 文档。我们查找了以下关键词（括号中给出了关键词）：Diego de Covarrubias y Leyva (Cobarrubias, Covarrubias, Covarrubias, Leyva), Martín de Azpilcueta (Aspilcueta, Azpilcueta, Azpilcueta, Navarro, Navarrus, Navarus, Nauarro), Juan de Mariana (Mariana), Luis Saravia de la Calle (Calle, Sarabia, Saravia, Sarravia), Jerónimo Castillo de Bovadilla (Bobadila, Bobadilla, Bovadila, Bovadilla, Castillo), Juan de Lugo (Lugo, Quiroga), Juan de Salas (Gonzalez, Salas), Tomás de Mercado (Mercado), Luis de Molina (Molina), Francisco de Vitoria (Victoria, Vitoria), Domingo de Soto (Domingo, Soto), Juan de Medina (Medina), Francisco Garcia (Garcia), Domingo de Banez de Mondragon (Banez, Mondragon), Francisco Suarez (Suarez), Leonard Lessius (Lessius)。

（1807）第一卷中引用的作者开始。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是奥古斯特·费迪南德·吕德（August Ferdinand Lüder）（52 次），其次是让·查尔斯·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de Sismondi）（37 次）、让-巴蒂斯特·萨伊（30 次）、亚当·斯密（26 次）、约翰·乔治·布希（Johann Georg Büsch）（24 次）和克里斯蒂安·冯·施洛泽（Christian von Schlözer）（19 次）。德国人吕德、施洛泽和布希都为生产成本或劳动价值论辩护。例如，吕德写道，“**因此，劳动是所有财货交换价值的真正衡量标准**”（Lüder 1800, 65；强调为原文）。吕德是亚当·斯密的明显追随者，正如他的书《根据亚当·斯密对待》（*Nach Adam Smith bearbeitet*）的副标题所示。

在所有被引用的学者中，唯一的主观主义经济学家似乎是让-巴蒂斯特·萨伊。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论》（*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1803）中为效用价值理论辩护，该论文比胡费兰的《基础》早四年出版。胡费兰在他的引言中称赞该论文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精确和部分自己的发展”，它“在细节上添加了一些新内容”（Hufeland 1815 [1807], xiv）。这没什么特别的，因为胡费兰在那里称赞了几位作者，包括亚当·斯密，但说明了萨伊的重要性。Say (1971 [1803], 62) 写到了主观价值：“人类赋予物体的价值源于它对物体的使用。”类似地：“产品的价值并非如一些作者错误地断言的那样，建立在生产机构的价值的基础上；并且，由于对一件物品的欲望源于其效用，因此它的价值也源于其效用，是创造效用的能力（在这种效用中产生了该欲望）为生产机构赋予了价值”（同上，287）。让我们将这些纲领性的陈述与胡费兰进行比较：

变成财货的东西（……）可能大部分是由**劳动制成的**，但它们不会因劳动而成为**财货**，但这完全取决于对它们的价值的想象，对它们作为手段达到一个人已经和想要达到的目的的适用性的想象（Hufeland 1815 [1807], 32；强调为原文）。

我们认为，胡费兰在主观价值方面胜过萨伊。法国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强调主观主义的本质：只有在我们的头脑或“想象”中，价值、成本、利润、效用等才存在。萨伊主要认为价值是由对象（效用）的使用决定的，而赫夫兰认为价值取决于我们在脑海中创造的**想象**用途。因此，我们不会在萨伊中读到“在商品和财富领域拥有绝对的意见主权”（同上，19）之类的句子。有一次，萨伊非常接近于表达主观价值理论的本质，就像胡费兰所做的那样，他用一种不方便的表述写道：“但比较的点在数量上是可变的，取决于评价者头脑中的估计程度”（Say 1971 [1803], 284）。但是胡费兰在他的书中（Roscher 1874, 657-8）的许多段落中都强调了这一点，而不是在 500 页的书中零星地强调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萨伊在其论文的早期版本中对价值理论的表述犯了一个错误，就像他在脚注中承认的那样（Say 1971 [1803], 285）。<sup>15</sup>因此，胡费兰对萨伊及其对价值理论的处理不满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改述萨伊，认为价值和有用性不是在生产中创造的（“*geschaffen*”）而是产生的（“*erzeugt*”）。Hufeland (1815 [1807], 33) 对此作出回应：“如果一个人真正考虑到，人的头脑确实有它自己的领域，它在其中创造一些东西，即它在自己或他人中创造想象，那么即使这一论点也只会以其完整的

---

<sup>15</sup> “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我曾将价值衡量标准描述为其他产品的价值，即比较点，这是不正确的。数量而不是其他产品的价值，是估价对象的价值衡量标准。”

力量和清晰性出现。”<sup>16</sup>Hufeland (1815 [1807], 32) 也认为这种主观观点必须不断地应用于经济理论。他把他的主观主义视为他自己的创新：

考虑到最后两点，请允许我再次明确指出，我在其中偏离了所有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即**斯密**及其继任者，**卡纳德**、**布希**、**卡尼尔**、**萨伊**、**西蒙德**等人。只是关于第一点，吕德已经注意到了一些属于它的某些东西。然而，第二点【主观主义】是导致整个视角发生最大变化的原因，如果它在各个方面都得到适当的执行和断言（Hufeland (1815 [1807], 32; 强调为原文）。<sup>17</sup>

Hufeland (1815 [1807], 15-24) 也没有在他关于财货和价值的部分的关键部分引用任何人——除了一次西斯蒙第，但在一个不重要的话题上。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施特莱斯勒的评估结合起来考虑，即胡费兰是“在主观经济概念上经常被引用的首位作者”（Streissler 1990a, 42），证明与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联系似乎非常困难。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德国经济学中主观价值理论的渊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sup>18</sup>在我们看来，德国文献中的主观主义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威廉·罗雪尔在他的经济思想史中暗示了这一点：“将他【胡费兰】与所有其他斯密主义者区别开来的特别之处在于两个特征：他的主要专业是**法理学**，第二专业是**哲学**，尤其是他的同胞康德的哲学”（Roscher 1874, 656; 强调为原文）。并且：“人

---

<sup>16</sup> “So sinnreich auch zur Rettung der Grundbehauptung desselben, daß alle Güter nur von der Natur herkamen, unter andern von Schmalz gefragt worden ist, 'seit wann denn das Schaffen nicht mehr aus schließlich in der Macht des Schöpfers sey', und seit wann 'die Menschen diese Macht mit ihm theilten? so ist freylich immer hiergegen schon die Bemerkung triftig, daß Hervorbringung in staatswirthschaftlicher Hinsicht keine Schöpfung, sondern nur Erzeugung des Werthes, der Brauchbarkeit sey\*\*【第一次提及萨伊】。Allein selbst dieses Argument wird doch erst dann in seiner vollen Kraft und Klarheit erscheinen, wenn man eben darauf eigentlich sieht, daß der Geist des Menschen allerdings wirklich seine Sphäre hat, in der er etwas schafft, nähmlich wenn er Vorstellungen bey sich undt and. Daß dem zu Folge ein Gut Gut, also das wird und ist, worauf hier alles ankommt, macht in der That dieser schaffende Geist allein möglich. Der Mensch kann freylich im andern Sinne so wenig schaffen, als vernichten; aber diese seine Unfähigkeit geht nur den Stoff an. Den Werth\*\*\*【第二次提及萨伊】 kann er wohl schaffen, indessen immer nur eben darum, weil dieser Werth allezeit ganz von der seiner eigenen Wirkung überlassenen Vorstellung abhängt”（Hufeland 1815 [1807], 33; 强调为原文）。

<sup>17</sup> “Nur darf immer dabey zweyerley durchaus nicht übersehen werden: 1) daß zwar sehr viele, aber bey weiten doch nicht alle, Mittel durch Arbeit vorhanden seyen oder entstehen, daß mehrere die Natur erzeuge; daß man ohne Uebertreibung sagen könne, die Natur habe an jedem, selbst durch die Arbeit erzeugten Gute Antheil; dann aber auch 2) welches noch viel wichtiger und bedeutender ist —daß die Dinge, welche Güter werden, zu solchen gebraucht werden können, zwar größten Theils durch Arbeit entstehen mögen; daß sie aber durch Arbeit nicht Güter werden, sondern daß dieses nur durch die Vorstellung von ihrem Werthe, von ihrer Tauglichkeit als Mittel zu einem Zwecke, den man hat und erreichen will, abhängt; daß also auch zu dieser Rücksicht auf Gütervermehrung eigentlich vor andern Ursachen Vielheit der Zweckhabenden und Mannigfaltigkeit der Zwecke wirken. Es sey mit erlaubt, in Rücksicht dieser beyden letzten Punkte nochmahls ausdrücklich zu bemerken, daß ich darin von allen bisherigen Schriftstellern über Staatswirthschaft, nahmentlich von Smith und seinen Nachfolgern, von Canard, Busch, Garnier, Say, Simonde ua abweiche. Nur in Ansehung des ersten Punctes hat Lüder schon einiges dahin Gehörige bemerkt; der zweyte hangen ist es eben, welcher in der ganzen Ansicht die größte Umänderung bewirkt, wenn er gehörig durchgeführt und in allen Rücksichten geltend gemacht wird”（Hufeland 1815 [1807], 31-2; 强调为原文）。

<sup>18</sup> 虽然胡费兰是“在主观经济概念上不断被引用的首位作者”，但也有其他德国经济学家早期为主观价值理论辩护。Komorzynski (1889, 65)提到了 Jacob、Soden、Lotz、Hufeland 和 Storch 的名字。

们最美妙地想起了康德，这种精神上的、反物质主义的感觉是胡费兰应用于经济学的。在任何地方，他都非常重视以经济事实为基础的心理过程”（同上，657-8；强调为原文）。

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康德，或许可以解释胡费兰的主观主义及其受到其他德国经济学家的好评。不仅因为它的精神、反物质意识。康德哲学倾向于将世界视为头脑的产物，其感知是由强加于世界的某些范畴所创造的。因此，一个人不能客观地感知世界，但一个人的头脑总是在感知中添加或混合一些东西。因此，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在每个头脑中主观地创造的，而客观地感知外部世界（*Ding an sich*）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哲学更倾向于将价值、成本或利润等概念也解释为在每个人的头脑中主观创造的现象，而不是像生产成本或劳动力这样的客观可理解的事实。

康德哲学也可以解释主观价值论的地理扩散差异。正如考德和后来的 Rothbard (2006a [1995], xii) 所建议的那样，这可能不是（完全）宗教问题，而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卡尔·勃兰特 (Karl Brandt, 1992, 162) 在他的《德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卷中（他没有提到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写道，德国古典经济学与外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区别是“唯心主义哲学对德国的影响”。在英国，知识界不是由理想主义的理性主义主导，而是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主导。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并没有坚持主观价值，而是通过外部世界的可观察现象（如劳动力或生产成本）来解释价值。奇怪的是，Menger (2007 [1871], 307) 在他的《原理》中谈到德国和英国在价值论上的差异时提到了哲学：“也许没有什么比对比德国和英国作家对价值理论的处理更能揭示出德国人对经济学的哲学渗透的倾向和英国人的实践意义了。”因此，主观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和在英国的衰落可能是两种当时盛行的哲学范式的结果。

## 六、一座横跨意大利的智慧桥梁？

我们已经知道，Huerta de Soto (2008 [2000], 34) 认为，意大利充当了“一座文化桥梁，帝国的两端（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的知识交流流经于它。”同样，罗斯巴德 (2006c [1976]) 认为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影响了加利亚尼，而加利亚尼又影响了孔狄亚克和杜尔哥。让我们看看这些观点是否得到引用的支持。我们从法国开始，然后回到西班牙。和格莱斯-哈钦森一样，我们没有在孔狄亚克或杜尔哥那里找到任何对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引用。<sup>19</sup>孔狄亚克关于经济学的主要著作是《在相互关系中考虑的商业与政府》（*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s relativement l'un à l'autre*, 1776）。门格尔在他的《原理》中六次引用这本书，其中两次是关于主观价值论的。但孔狄亚克并没有在他的书中引用加利亚尼。我们的第二位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在《原理》中被引用了八次。门格尔四次提到杜尔哥的代表作《对财富形成与分配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1766）。杜尔哥也没有提到加利亚尼。因此，没有引用证据表明加利亚尼影响了孔狄亚克或杜尔哥。尽管如此，他们的其他作品中也可能引用了加利亚尼，特别是因为 Grice-Hutchinson (1952, 63) 似乎已经发现了引用。

---

<sup>19</sup> 我们在孔狄亚克的《商业》和杜尔哥的《思考》中寻找引文。



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意大利经济学家怎么样？我们对他们在《原理》中引用的所有作品进行了关键词研究。有 13 位经济学家的 16 本作品。结果：三位作者总共引用了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六次。它们一处是加利亚里的《论货币》（*Della Moneta*, 1751）中众所周知的引用，一处是在达万扎蒂的《关于货币的课程》（*Lezioni delle monete*, 1588），四处是卡利（Carli）的《关于货币的起源和商业》（*Dell'origin e del commercio della moneta*, 1751）。尤其是加利亚尼的书非常重要，因为门格尔赞许地引用了它关于主观价值论的话：“本着【与亚里士多德】同样的精神，费迪南多·加利亚尼（……）写道：‘既然人的灵魂性情和需求不同，那么事物的价值也就不同’”（Menger 2007 [1871], 296）。<sup>20</sup>门格尔因此知道加利亚尼的价值理论，他很可能偶然发现了科瓦卢比亚斯的名言。表 4 显示了门格尔在其《原理》中引用的所有意大利经济学家。可以看出，门格尔主要引用了他们关于货币起源的话（21 处引用中的 18 处）。绝大多数引用是认可的。门格尔仅不同意 21 处引用中的 4 处。但在加利亚尼和蒙塔纳里，只有两句话是关于主观价值理论的。让我们从卡利对马里亚纳的《论国王》的四处引用开始。最有趣的引文可能如下：

话虽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如果不从国家手中夺走商业或货币，就不可能随意改变硬币。然后，圣师胡安·德·马里亚纳明确地确定国王不能在**没有国家建议的情况下贬值硬币**（Carli 1751, 38；强调为原文）。

卡利赞许地引用了胡安·德·马里亚纳对通货膨胀（被理解为铸币贬值）的扭曲效应的描述。其他三处引用是关于伊比利亚半岛上国王贬值硬币的历史事件。一个例子是 14 世纪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他用新硬币代替了旧硬币，这导致了更高的食物价格和饥荒（Carli 1751, 53）。下一位意大利作者是引用科瓦卢比亚斯的达万扎蒂：

总而言之，国家铸币厂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用于铸币的金属，就提供什么样的浇铸金属。因此，铸币厂会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入到费用中吗？从来没有，因为许多人根据常识认为这笔费用应该由市政厅支付【参考科瓦卢比亚斯】来保持共和国的血液（Davanzati 1804 [1588], 46）。

“来保持共和国的血液”也可以翻译为“来保持共和国的生命”。这句话基本上说政府应该承担造币成本。提到科瓦卢比亚斯的脚注指出：“这个观点是基于 Bart. in 1. I ff. *de vet. num. potest. lib. II* contr. Innoc. 另见 Couvarruv. *veter. collat. numism. cap. 7* n. 5. Id.”（同上，强调为原文）。最后，我们来到了《论货币》第二章——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对科瓦卢比亚斯的引用。加利亚尼在本章开始时批评了亚里士多德的货币起源理论。之后他写道：

然后，我们很清楚主教科瓦卢比亚斯如何继续追随他的大师【亚里士多德】，他指出：**如果硬币不是从其本质而是从君主那里获得价值的，并且因为他，被召回的法律会变得无效，当然，材料被判断为不价值金银；虽然如果从本质上判断它在法律上没有价值；法学家和道德学**

---

<sup>20</sup> “由于人的心性不同，事物的价值也就不同”（Menger 2007 [1871], 296）。

家的整个队伍基本上由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组成，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如果这个基础是真的，那么这些后果的真实性就很清楚了。但万一它们是致命的并给人们带来痛苦和悲伤，我不希望看到这一点被经验证明（Galiani 1803 [1751], 56; 强调为原文）。

科瓦卢比亚斯认为“硬币不是从其本质而是从君主那里获得价值的”。加利亚尼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和科瓦卢比亚斯的观点。他在第一章中论证说，货币的价值是由金银的使用价值决定的（Giocoli 2001, 98）。科瓦卢比亚斯在这里捍卫了 Grice-Hutchinson (1952, 31) 称之为“唯名论 (nominalism)”的古老中世纪观点。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已经将他们的主观价值论应用于货币。但加利亚尼没有引用或承认他们的理论改进。无论哪种方式，加利亚尼都得出以下结论：

出于这个原因，在任何人之前，我会做任何事情来证明，感谢我所有的研究，我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的事实，不仅是构成硬币的金属，而且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无一例外，从某些普遍的、不变的原则出发，都有自己的价值；心血来潮、法律、君主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破坏这些原则及其效果；最后，正如经院哲学家们所说，在估计中，人是被动的（Galiani 1803 [1751], 57; 强调为原文）。

因此，加利亚尼不赞成地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奇怪的是，门格尔在同一主题上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他写道，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科瓦卢比亚斯在货币起源方面没有改进。这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价值理论中似乎没有批准对科瓦卢比亚斯的引用。加利亚尼要么不知道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主观主义贡献。这将指向 Hülsmann (2007, 112) 的评论：他们“关于价值和价格本质的发现分散在数千页中”。或者他知道他们的主观主义发现，因为加利亚尼神父不太可能不熟悉道德神学文献。罗斯巴德 (2006 [1976]) 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点：“加利亚尼的叔叔塞莱斯蒂诺抚养了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成为大主教之前曾担任道德神学教授，因此无疑熟悉有关该主题的经验哲学文献，这些文献充斥着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图书馆。” Grice-Hutchinson (1952, 76) 写道：

对刚刚提出的事件版本最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孔狄亚克、杜尔哥和加利亚尼都声称他们自己对实用性和稀有性的强调是一种新奇事物。这三位作家都以他们的学识而著称，尤其是在神学和法学方面。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读过上面提到的任何书籍。作为 18 世纪的哲学家，他们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欠了决疑者 (casuists)。但是，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或哈奇森都不可能出现这种不情愿。我只能假设加利亚尼在一些早期作者的作品中遇到了这种价值理论的基本要素，并且他表达这些古老真理的机智和优雅使它们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像是创新。无论如何，我们西班牙的作家及其继任者作品中存在的主观价值论很可能为加利亚尼的伟大杰作立即获得好评铺平了道路。<sup>21</sup>

---

<sup>21</sup> Roover (1974, 334) 同意格莱斯-哈钦森的观点：“问题出现了，这个想法是起源于两位神父【孔狄亚克和加利亚尼】，还是——更有可能——他们是从圣师那里得到的，可能是最近正如马乔里·格莱斯-哈钦森似乎认为的那样【在她的著作《萨拉曼卡学派》中】。在我看来，她无

当然，格莱斯-哈钦森和罗斯巴德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论点，为什么加利亚尼可以从（西班牙）学者那里借鉴。Roover (1974, 319) 观察到加利亚尼、杜尔哥和孔狄亚克所属的 18 世纪哲学家：“每当哲学家们提到圣师们时，他们都会以轻蔑和轻蔑的语气称他们为‘决疑者’。他们提到他们只是为了批评；当他们向他们借用时，他们不给他们任何功劳。”他进一步表明，杜尔哥和孔狄亚克参与了这次针对圣师们的攻击（Roover 1974, 319-20）。但是，虽然有可能加利亚尼借用了，但最后我们只能推测这一点。没有确凿的证据——像德国经济学家和门格尔那样——证明加利亚尼接受了（西班牙）经院哲学的价值学说。也可能是在查阅学术文献之前，他自己发现了主观理论。或者，也许他不是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那里借用的，而是从意大利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那里借用的。

事实上，即使加利亚尼会赞扬西班牙的价值理论，他对后来经济学家的影响仍然存在疑问。Joseph Schumpeter (1994 [1954], 302) 同意罗斯巴德和格莱斯-哈钦森的观点，即加利亚尼“预见未来百年的价值理论（……）”。但他指的是怎样的价值论呢？我们在孔狄亚克、萨伊或胡费兰中发现的那种价值理论？不，他提到了另外三个名字：“李嘉图和马克思”和“A. 斯密”。熊彼特在《论货币》的第二章（同上，300-2）中发现了一种主观的和一种劳动的价值理论。他不是唯一的历史学家——Giocoli (2001, 96) 谈到“一些解释者”同意这一观点。一方面，加利亚尼首先将价值定义为主观的：“事物的价值随着人的想法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Galiani 1803 [1751], 58）。但随后他突然声称：

我转而讨论劳动。仅此一点就赋予了事物价值，无论它们完全是艺术品，例如绘画、雕塑、雕刻等，还是诸如矿物、石头、野果树等之类的东西。这些物体中材料的数量除了增加或减少工作外，对价值没有其他贡献（Galiani 1803 [1751], 74-5）。

这段话似乎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尽管如此，Giocoli (2001, 132) 在他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再将加利亚尼也视为劳动价值论的先驱。”对我们来说，加利亚尼最终想说的话并不那么重要。我们只需要注意，他对价值理论的介绍存在混淆。因此，《论货币》也可能传播了劳动价值论。奇怪的是，卡尔·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的脚注中引用了加利亚尼：

参见例如 Galiani, in vol. 3 of “Della Moneta,”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ublished by Custodi). Parte Moderna, Milano, 1803. “他说，只有努力才能赋予任何事物价值（La fatica, he says, è l’unica cosa che dà valore alla cosa）”。将劳动称为“fatica”、紧张、努力，是南方人的特征（Marx 1903 [1859], 65）。

---

疑是对的，因为有教养的修士不熟悉关于道德神学的大量文献是极不可能的。就加利亚尼而言，经院哲学影响在他关于货币的文章的许多段落中都很明显，特别是在他对高利贷和变化的处理方面。此外，关于价值的章节还引用了萨拉曼卡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迭戈·德·科瓦卢比亚斯·莱瓦。因此，加利亚尼知道他的工作，并且没有破坏连续性。”

在正文中，马克思写道，一些意大利经济学家“接近于对商品性质的正确分析”（同上）。因此，总而言之，我们没有找到太多引证证据表明科瓦卢比亚斯、加利亚尼、孔狄亚克和杜尔哥之间存在联系，也没有发现跨越意大利的知识桥梁。

表 4  
引用门格尔《原理》的意大利经济学家

作者 (*-†)	被引用的作品 <sup>1</sup>	引用的主题	引用 <sup>2</sup>	参考西班牙 经院哲学家
赫米尼亚 诺·蒙塔纳利 (1633-1687)	Della moneta III	货币的起源 *、主观价值 论、价格理论 *	3	0
安东尼奥·热 诺维西 (1712- 1769)	Lezioni di commercio o sia d'economia Civile (1769)	货币的起源 (2)，商品一 词的定义*	3	0
费迪南多·加 利亚尼 (1728- 1787)	Della moneta I/II (1750, 1780, 1831)	主观价值论、 货币的起源	2	1
贾马利亚·奥 尔特斯 (1713- 1790)	Della economia nazionale, Lettere Di Giammaria Ortes 在 Proposito del Suo Libro Della Economia Nazionale XVI	货币的起源	2	0
彼得罗·维里 (1728-1797)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Riflessioni sulle leggi vincolanti	货币的起源	2	0
乔瓦尼·巴蒂 斯塔·科尔尼 亚尼 (1742- 1813)	Riflessioni sulle monete III, Lettera ad un legislatore	货币的起源	2	作品无法获 取
贝尔纳多·达万 扎蒂 (1529- 1606)	Lezioni delle monete (1588)	货币的起源*	1	1
吉安·里纳尔 多·卡利 (1720-1795)	Dell'origine e del commercio della moneta	货币的起源	1	4
萨卢斯蒂 奥·班迪尼 (1677-1760)	Discorso economico (1787)	货币的起源	1	0
蓬佩奥·内里	Osservazioni sopra il	货币的起源	1	0

(1706-1776)	prezzo legale delle monete (1751)			
卡洛·安东尼奥·布罗贾 (1698-1767)	Trattato de'tributi, delle monete e del Governoro politico della sanita (1743)	货币的起源	1	0
梅尔基奥尔·吉欧哈 (1767-1829)	Nuovo prospetto delle scienze economiche I (1815)	货币的起源	1	0
切萨雷·贝卡利亚 (1738-1794)	Elementi di economia pubblica II	货币的起源	1	0

注：1 罗马字母表示卷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门格尔所引用的版本。

\*表示门格尔不赞成引用作者的话。

## 七、结论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是否在思想史方面影响了卡尔·门格尔？我们发现的证据说不。以下列表总结了主要结果：

- 1) 在门格尔的著作中引用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一段话（科瓦卢比亚斯）。
- 2) 卡尔·门格尔藏书中的两本书（莫利纳和科瓦卢比亚斯）。
- 3) 罗雪尔引用了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三次（马利亚纳）——在《原理》中至少被引用两次的所有德国经济学家中。
- 4) 很少有证据表明胡费兰在价值理论方面受到萨伊的影响。
- 5) 加利亚尼在价值理论上引用了西班牙经院哲学家 1 次（科瓦卢比亚斯）——在 13 位被《原理》引用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中的 12 位中。

因此，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直接影响了门格尔，表明他们影响了影响门格尔的德国人，或者表明他们影响了影响门格尔的意大利人。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罗斯巴德所说的从加利亚尼到孔狄亚克和杜尔哥再到萨伊的学术联系：

- 1) 孔狄亚克和杜尔哥没有在他们的主要著作《商业与政府》和《思考》中引用加利亚尼或西班牙经院哲学家。
- 2) 加利亚尼不赞成地引用了科瓦卢比亚斯在《论货币》中对货币价值的看法。
- 3) 加利亚尼对价值理论的表述是模棱两可的。

如前所述，我们应该对一些结果保持谨慎，因为我们的关键词研究方法可能效果不佳。不管怎样，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不应该被认为是门格尔思想的鼻祖或先驱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任何为西班牙起源论辩护的人都必须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选择西班牙作为门格尔思想的主要起源。在中世纪中期，许多学者已经转向了一种相当主观的价值理论（Rothbard 2006c [1976]）。托马斯·阿奎

那在他的《神学概要》（*Summa Theologiae*, 1265-73）中写道：“可售物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它们的本质程度，因为有时一匹马的价格高于奴隶；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的有用性”（Casey 2010）。更清楚的是让·布里丹（Jean Buridan）（1300-58）：

“财货的价值是由人的需求来估计的……因此，需求的满足是衡量可售财货的真正标准。但似乎这种满足是由需求本身来衡量的。因为当被满足的需求大的时候，满足就更大……正如葡萄酒在稀缺时更昂贵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因为我们更需要它”（Grice-Hutchinson 1952, 27）。

布里丹似乎在价值论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不仅说“人的需求”决定价值，还把稀缺性作为决定价格的一个因素。在此背景下，让我们再看一下科瓦卢比亚斯的全文：

首先，对于买卖合同和类似的交换合同的情况，我们绝不能关注也不能相信公允价格来源于物品的性质，而是来源于人的评估，即使这种评估可能是不健全的：因为如果要观察物品的本质，由于马的用处，一匹马的价值将超过一枚珍贵的宝石，并且，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一切有生命和气息的东西，比死气沉沉的东西更有价值，正如康拉德 [Summenhart von Calw] 在他的《合同条约》条目 56.2 中所设想的那样。因此，在印度人那里，小麦的售价比在西班牙高，至少在考虑人们对小麦的共同估价，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内在性质（这在西班牙人那里和印度人那里是相同的）的时候（科瓦卢比亚斯 [1556] 1661, 122；自己强调和翻译）。

斜体部分表明，科瓦卢比亚斯在他的价值判断中有客观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将这句话与布里丹进行比较，科瓦卢比亚斯在价值理论方面真正改进了多少这个问题就出现了。<sup>22</sup>另一个反对西班牙-奥地利联系的反对意见，是一种仅流经意大利的学术影响的可能性。Roover (1974, 327) 指出：“就像在西班牙一样，在意大利，经院哲学传统特别强大，并且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在德国或奥地利文献中，意大利经济学家得到的引用似乎也比他们的西班牙同事多得多。在被《原理》引用的 13 位意大利经济学家中，Roscher (1874, 1049-62) 在他的德国思想史中 15 次引用了 8 位经济学家，而西班牙的经济思想几乎不存在。翻译自意大利语或以意大利语出版的书籍占卡尔·门格尔藏书的 3.57%（575 本书），而西班牙文献仅占 0.19%（31 本书），西班牙经院哲学占 0.01%（2 本书）。因此，可能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在传播经院哲学价值学说方面没有发挥作用，尽管他们将经院哲学经济思想推向了最高水平。

此外，由于缺乏对边际主义的理解，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从未预料到真正的门格尔主义成就。门格尔的成就不是承认价值是主观的。正如 Schumpeter (2003 [1952], 83) 所指出的：“可以证明，几乎每一位古典经济学家都试图从这一认识

---

<sup>22</sup> 罗克·桑佩德罗（Roque Sampedro）向作者指出，科瓦卢比亚斯在写道：“一切有生命和气息的东西，就其本质而言，比死气沉沉的东西更有价值”时，采取了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即使我们忽略这段话，宝石与马的比较仍然存在。

开始，然后将其抛在一边，因为他无法用它取得进展（……）。”门格尔（和德国经济学家）的成就是建立了一种一般理论，试图以主观价值为基础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同上）。相比之下，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们只在松散地表达一些现代经济见解的内容方面取得了成就。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指出：

分析家的智识成就不在于表达基本原理的陈述的内容，而在于他知道如何使它富有成效，以及如何从中得出有关科学的所有问题（同上）。<sup>23</sup>

因此，毫不奇怪，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们从未将价格或资本理论嵌入到一个一致的、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中。或者就像 Hülsmann (2007, 112) 所说的那样：“西班牙后期经院哲学家从未专门撰文探讨经济学，他们对价值和价格本质的揭示，散落于卷帙浩繁的文献之中。”最后，如果德国经济学确实是对门格尔的主要影响，那么奥地利学派受亚当·斯密的影响可能比它今天的许多主要代表者愿意承认的要大。众所周知，门格尔 (1985 [1883], 49) 称亚当·斯密为“我们科学的伟大创始人”，并且他对他的《国富论》非常熟悉。Streissler (1990b, 111) 总结了门格尔对王储鲁道夫的讲稿：“从讲稿中可以明显看出，门格尔已经完全吸收了斯密的思想路线，早在他【在 1876 年】一接到通知就立刻给王储上课之前，他就已经仔细研究过斯密。”<sup>24</sup>

亚当·斯密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明来自于这一发现，即门格尔拥有 20 个(!) 不同版本的《国富论》。如果没有施特莱斯勒的研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版本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好奇心。但在上述背景下，他们说明门格尔很可能是一个明显的追随者，甚至可能是斯密的崇拜者。如果这是真的，门格尔将自己视为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斯密而不是经院哲学。更重要的是，德国经济学也深受亚当·斯密的影响 (Streissler 1990b, 128-9; Brandt 1992, 160; Schumpeter 1994 [1954], 503)。正如熊彼特（同上）所写：

斯密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李嘉图（经常被误解）的影响，并摆脱了关于 18 世纪行政政策的一些陈旧东西——这是直到（甚至稍微超过）所调查时期的结束【1790-1870】德国经济学的特征。<sup>25</sup>

因此，至少在目前，最好不要将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解释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或起源——因为这引发了圣师们影响了门格尔这一未经证实的概念——而是作为它的先行者。

## 参考文献

---

<sup>23</sup> 克里斯蒂安·施耐德 (Christian Schneider) 提请我注意这句话。

<sup>24</sup> 在其他地方，Streissler (1994, 8) 甚至锐利地称《国富论》为门格尔的“圣经”。

<sup>25</sup> 在这一点上，未来研究的可能性打开了。这项工作侧重于大陆传统，因为格莱斯-哈钦森、韦尔塔·德索托和罗斯巴德主张通过意大利和法国经济学家进行传播。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英国传统及其对门格尔的影响。Rivas (2013, 83-94) 认为亚当·斯密受到格老秀斯、普芬道夫和哈奇森的学术影响，但与罗斯巴德一样，得出的结论是，斯密没有采用某些学术著作中出现的主观价值论（同上，87-8）。然而，西班牙经院学说的其他部分可能是通过英国传统传播的。另见 Álvarez (2015)，他认为约翰·洛克受到了胡安·德·马里亚纳的影响。

ÁLVAREZ, Á. M. F. (2015): “Juan de Mariana. Transmisión de las ideas de economía política de España hacia Inglaterra en el siglo XVII.” *Iber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 (2): 32-59.

BÖHM-BAWERK, E. V. (1890 [1884]): *Capital and Interest. A Cr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BRANDT, K. (1992):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Band 1: Von der Scholastik bis zur klass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Freiburg: Rudolf Haufe Verlag.

BRAUN, E. (2016):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Forschung und Praxis* 68 (2): 126-135.

CARLI, G. R. (1751): *Dell’Origina e del Commercio della Moneta e dell’Instituzione della Zecche d’Italia*. All’Haja.

CASEY, G. (2010):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the Scholastics to Economics*. Mises Daily. <https://mises.org/library/major-contributions-scholastics-economics>, last access on 14/10/2016.

CHAFUEN, A. (1991 [1986]): *Economía y Ética. Raíces cristianas de la economía de libre mercado*. Madrid: Ediciones Rialp, S. A.

COVARRUBIAS Y LEYVA, D. D. (1661 [1556]): *Opera omnia*. Lugdunum: Boissat. [http://reader.digitale-sammlungen.de/de/fs1/object/display/bsb10796622\\_00131.html](http://reader.digitale-sammlungen.de/de/fs1/object/display/bsb10796622_00131.html), last access on 14/10/2016.

DAVANZATI (1804 [1588]): “Lezioni delle monete.” in: Anton Maria Salvini (ed.). 1804.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e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antica. Tomo II*. Milan: Nella Stamperia e Fonderia di G. G. Destefanis: 19-50.

GABRIEL, A. (2012): “Why was the Reception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Mises’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so Lukewarm?” in: Jörg Guido Hülsmann (ed.).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Fiduciary Media*.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37-61.

GALIANI, F. (1803 [1751]): “Della Moneta.” in: Anton Maria Salvini (ed.). 1804.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e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moderna. Tomo III*. Milan: Nella Stamperia e Fonderia di G. G. Destefanis: 23-318.

GIOCOLI, N. (2001): “Value and Interest in Ferdinando Galiani’s “Della Moneta”.”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9 (3): 95-135.

GRICE-HUTCHINSON, M. (1952):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1544-1605*.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 (1978): *Early Economic Thought in Spain 1177-174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1998): “Una nota sobre la difusión del pensamiento económico salmantino.” in: Francisco Gómez Camacho/Ricardo Robledo (ed.). *El pensamiento económico en la escuela de Salamanca. Una visión multidisciplinar*. Salamanca: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241-8.

HERMANN, F. V. (1832): *Staatswirth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Vermögen, Wirthschaft, Productivität der Arbeiten, Kapital, Preis, Gewinn, Einkommen und Verbrauch*. München: In der Anton Werber’schen Buchhandlung.

— (1874): *Staatswirth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Second Edition. München: Adolf Ackermann.

HILDEBRAND, B. (1848):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First Volume*. Frankfurt am Main: Literarische Anstalt.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16a): *Luis de Molina in Carl Menger Collection*. [https://opac.lib.hit-u.ac.jp/opac/opac\\_details/?lang=1&bibid=0000381801](https://opac.lib.hit-u.ac.jp/opac/opac_details/?lang=1&bibid=0000381801), last access on 14/10/2016.

— (2016b): *Diego de Covarrubias y Leyva in Carl Menger Collection*. [https://opac.lib.hit-u.ac.jp/opac/opac\\_details/?lang=1&bibid=0000388879](https://opac.lib.hit-u.ac.jp/opac/opac_details/?lang=1&bibid=0000388879), last access on 14/10/2016.

HÜLSMANN, J. G. (2007): *Mises. 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HUERTA DE SOTO, JESÚS (1999): “Juan de Mariana: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nish Scholastics.” in: Randall G. Holcombe (ed.). *15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12.

— (2008 [2000]): *The Austrian School. Market Order and Creativit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2009a [1997]): “Interview: the Spanish root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in: Jesús Huerta de Soto (ed.).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New York: Routledge: 263-275.

— (2009b [1999]): “Juan de Mariana and the Spanish Scholastics.” in: Jesús Huerta de Soto (ed.).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New York: Routledge: 204-10.

— (2010 [2009]): *Four Hundred Years of Dynamic Efficiency*. Mises Daily. <https://mises.org/library/four-hundred-years-dynamic-efficiency>, last access on 14/10/2016.

HUFELAND, G. (1815 [1807]): *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hschaftskunst durch Prüfung und Berichtigung ihrer Hauptbegriffe von Gut, Werth, Preis, Geld und Volksvermögen mit ununterbrochener Rücksicht auf die bisherigen Systeme. Erster Band.* Wien: Bauer.

KNIES, K. (1855): "Die nationalökonomische Lehre vom Werth."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1 (3/4): 421-475.

— (1883): *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e.* Braunschweig: C. A. Schwetschke und Sohn.

KOMORZYNSKI, J. V. (1889): *Der Werth in der isolierten Wirthschaft.* Wien: Manz'sche Hof-, Verlagsund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LÜDER, A. F. (1800): *Ueber Nationalindustrie und Staatswirthschaft. Nach Adam Smith bearbeitet. Erster Theil.* Berlin: Heinrich Frölich.

MANGOLDT, H. V. (1863): *Grundriß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 Ein Leitfaden für Vorlesungen an Hochschulen und das Privatstudium.* Stuttgart: Verlag von J. Engelhorn.

MARX, K. (1903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 (1909 [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MENGER, C. (1871):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 Wien: Wilhelm Braumüller Hofund Universitätsbuchhändler.

— (1985 [1883]):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2007 [187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MISCHLER, P. (1857): *Grundsätze der National-Oekonomie.* Wien: Verlag von Friedrich Manz.

MISES, L. V. (1922): *Die Gemeinwirtschaft.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ozialismus.* 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

— (1990 [1962]): "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 in 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 in: Richard M. Ebeling (ed.).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Norwel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37-51.

RIVAS, L. G. (2013): "Adam Smith: algunos antecedentes olvidados." *Procesos de Mercado* 10 (2): 73-98.

ROOVER, R. D. (1974): "Scholastic Economics: Surviving and Lasting Influence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Adam Smith." in: Julius Kirshner (ed.).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6-335.

ROSCHER, W. (1843): *Grundriß zu Vorlesungen über die Staatswirthschaft. Nach geschichtlicher Methode*. Göttingen: Druck und Verlag der Dieterichschen Buchhandlung.

— (1864 [1854]):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Ein Handund Lesebuch für Geschäftsmänner und Studierende. Band I*. Fifth Edition. Stuttgart: Verlag der J. G. Gottaschen Buchhandlung.

— (1874):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R. Oldenburg.

— (1897 [1854]):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Ein Handund Lesebuch für Geschäftsmänner und Studierende. Band I*. Twenty-Second Edition. Stuttgart: Verlag der J. G. Gottaschen Buchhandlung.

ROTHBARD, M. (2006a [1995]):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ume I*.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2006b [1995]): *Classical Economics.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ume II*.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2006c [1976]): *New Light on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http://mises.org/library/new-light-prehistory-austrianschool>, last access 14/10/2016.

SAY, J. B. (1971 [1803]):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Or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 New York: August M. Kelley Publishers.

SCHÄFFLE, A. (1867): *Das gesellschaftliche System der menschlichen Wirthschaft. Ein Lehrund Handbuch der Nationalökonomie für alle höhere Unterrichtsanstalten und Gebildete jedes Standes*. Second edition. Tübingen: Verlag der H. Laupp'schen Buchhandlung.

— (1870): *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äftsund Vermögensformen*. Tübingen: Verlag der H. Laupp'schen Buchhandlung.

SCHÜLLER, R. (1899): *Die Wirthschaftspolitik der Historischen Schule*. Berlin: Carl Heymanns Verlag.

SCHÜZ, K. W. (1843): *Grundsätze der National-Oeconomie*. Tübingen: Druck und Verlag von C. S. Osiander.

SCHULAK, E. M./ UNTERKÖFLER, H. (2011):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 History of Its Ideas, Ambassadors, and Institutions*.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SCHUMPETER, J. (1994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2003 [1952]):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STEIN, L. V. (1858): *Lehrbuch der Volkswirtschaft. Zum Gebrauche für Vorlesungen und das Selbststudium*. Wien: Wilhelm Braumüller Hofbuchhändler.

STREISSLER, E. (1989): “Der Unternehmer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Bernhard Gahlen/ Bernd Meyer/ Jochen Schumann (ed.). *Wirtschaftswachstum, Strukturwandel, und dynamischer Wettbewerb*. Berlin: Springer-Verlag: 1733.

— (1990a):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economics on the work of Menger and Marshall.” in: Bruce J.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3168.

— (1990b): “Carl Menger on economic policy: the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in: Bruce J.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07-130.

— (1994): *Carl Menger's Lectures to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Unlimited.

— (1997): “Carl Menger, der deutsche Nationalökonom.” in: Birger P. Priddat (ed.). *Wert, Meinung, Bedeutung. Die Tradition der subjektiven Wertlehre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vor Menger*. Marburg: Metropolis Verlag: 33-88.

WINKEL, H. (1977): *Die deutsche Nationalökonomie im 19. Jahrhunder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YAGI, K. (2011): *Austrian and German Economic Thought. From Subjectivism to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